

# 南椰之風與繁櫻之雨



●前排右起周耀門董事、陳田植董事長、陳田柏教授(董事會顧問)、陳田圃董事  
後排右起陳建志秘書、方惠芳秘書

## ■ 董事會顧問 / 陳田柏

在校園中穿梭往返時，我總習慣於沿著椰林道上走；清晨從停車場走向附院，涼風習習，椰葉輕拂如叮嚀；而當陽光灑在椰林道上時，屹立不搖的椰子樹似乎煥發著堅韌卓絕的精神。不記得這一排高大昂揚的椰子樹是從何時聳立在這裡，但總覺得它代表著高醫的精神；而我，就在南椰之風的吹拂中成長為醫師，也在南椰之風的召喚下從日本返回母校就職至今。

歲月如梭，今日即將從服務四十餘載的醫療界退休，心中自有無限感慨。我是高醫醫學系第二屆的學生，回顧入學時的高雄醫學院，只有二層樓高的第一棟校舍孤立於稻浪翻風的田野間，學校設備仍在草創階段。然而感謝陳啓川前董事長與杜聰明前院長創辦了這個學校，由台大醫學院聘請了多位優秀的老師來到南台灣，如郭宗波教授、鄭金松教授、陳章義教授、廖潤生教授、沈祖杰教授、江金培教授…等。雖然在物質環境極差的年代、在刻苦耐勞的環境之中，老師們卻具有令今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教學熱忱與研究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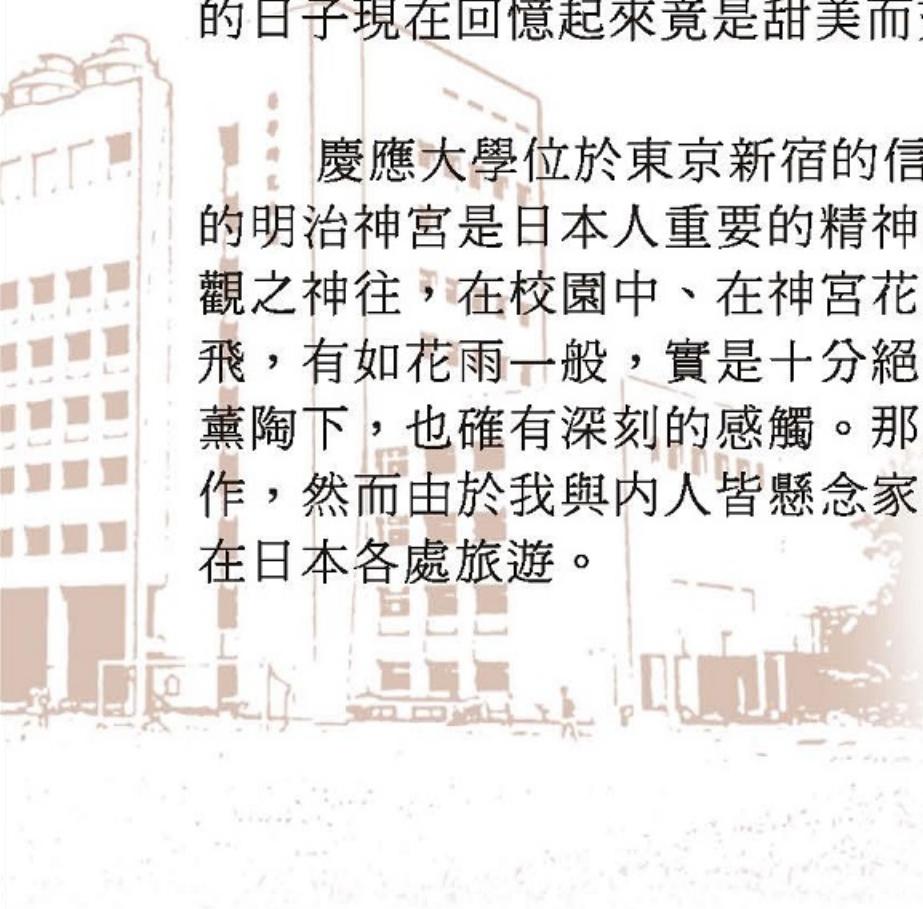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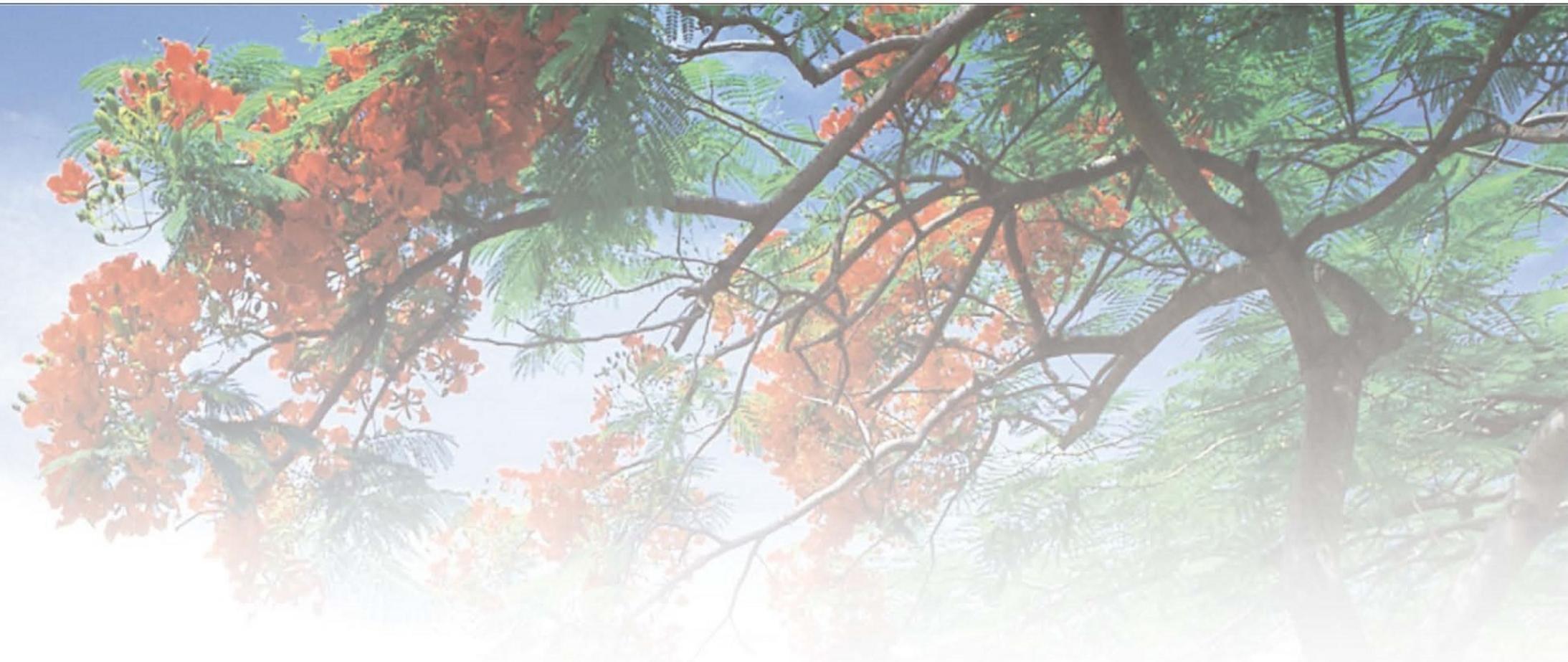
實在說來，入學第一年對何謂「醫學」猶是懵懵懂懂；印象較深刻的是第二年的暑假，校方召集所有家居高雄的學生來為學校繪製醫學掛圖與講義。第三年暑期更有意思的是，謝獻臣教授自高雄縣、屏東縣採集許多檢體回來，由我們這些學生來檢驗寄生蟲；做一份檢體可得一份補助，暑期尾聲時同學們恰好集資去阿里山旅行，真是難忘的歡樂旅行。第四、第五年在生化教室跟隨楊振忠教授做蛇毒研究，當時張均昌教授擔任助教，一起做研究的還有學長蔡瑞熊前校長等數人；在生化教室所受的訓練對我日後赴日本求學研究有許多助益。

第六年在附院實習，面臨選擇科別的重要思考。原本對基礎醫學之生化學、病理學頗感興趣，但家族中前輩學醫者認為應選擇臨床科；另一方面，家父則希望我選擇公共衛生學，當時尚不十分瞭解其理念，後來在醫療生涯中漸漸深刻地體會家父重視公共衛生、重視全民健康的深意。公衛要以內科學為基礎，因此幾經思考終於決定先進入內科學領域。服完兵役後進入本校附院內科擔任住院醫師，經二年半後赴日留學。

1965年七月，在師長們及家父的支持鼓勵之下，攜帶著簡單的行囊抵達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展開了留學生涯。家父亦是慶應大學的畢業生，於其早年成長經驗中，慶應大學的校風精神有著深遠的影響，他常提示的「獨立自尊」的精神即是慶應大學的校訓，這也是做為一個私立大學在公立大學的環伺之下追求卓越的基本精神。首先在家父摯友濱口醫師的介紹下，我進入了醫學院附屬醫院內科的血液科，除了適應新環境之外，立刻投入了國家執照考試的準備。一年後取得執照並擔任內科學助手（即住院醫師）。隨即在長谷川彌人教授的指導下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選擇了造血因子EPO為研究題材。在臨床醫療工作之餘攻讀學位、從事研究是相當繁忙的；看完病患、結束一天的臨床工作後，在晚間六點開始在實驗室進行動物實驗、做研究，往往持續到十一、二點才拖著疲累的腳步返家，從不會在九點鐘前回到家。甚至在獲得博士學位後仍舊持續這種臨床與研究並進的日子，印象中有十一年是沒有週日的日子。內人出身岡山望族，在台灣時參加扶輪社活動、週末打打高爾夫球，生活可稱愜意；與我赴日後，因處於不易匯款的年代，我們生活十分儉約，內人量入為出，辛勤照顧孩子，每逢週日帶著孩子們到緊鄰慶應大學的明治神宮去騎腳踏車玩耍，並等候我中午時分一起享受午餐與親子之樂。博士學位要求必修二項外語，且不得是日文與中文，我選了英文與德文，為了加強德文，我有數年期間到慶應附屬高中醫務室打工（日制住院醫師並無薪水，且留學生不得在校外打工），每月賺取一萬五千元日幣去學德文。為了夜間無電車時醫院呼叫所需，我買了一部小車，嚴冬寒凍，久停之後夜間要開車時，汽車輪胎竟呈扁形攤在雪地上。年輕時候辛苦奮鬥的日子現在回憶起來竟是甜美而充滿趣味的，所謂一步一腳印，凡努力過的必留下痕跡。

慶應大學位於東京新宿的信濃町，是具有歷史與傳統的私立大學，校園內建築雅致、花木扶疏；鄰近的明治神宮是日本人重要的精神殿堂，樹木參天，四季景致宜人；尤以每年春季霎時綻放的櫻花最是令人觀之神往，在校園中、在神宮花園中信步走著，偶然遇見一樹淺紅或一樹純白的櫻花，和風輕拂、落櫻紛飛，有如花雨一般，實是十分絕美。或謂日人因繁櫻景致絕美而有追求完美的民族文化，我在這個文化的薰陶下，也確有深刻的感觸。那段日子裡，每年只有暑期一個月及過年的短暫休假得以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然而由於我與內人皆懸念家鄉雙方的父母，因此每逢休假立即趕回台灣探望父母，旅日期間反而並未在日本各處旅遊。





在慶應大學的第八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被派往慶應大學伊勢分院（250床）支援，每週支援四日（三日仍在本院），每回前往需搭乘新幹線到名古屋再轉往伊勢，單程車程即需五小時，共支援了八個月。如此每週奔波，使我至今在日旅遊時盡量避免搭乘新幹線。在伊勢支援時晚間閒暇無事，我便自行裝置了一個音響，從零件到外殼皆自行製作，還在新幹線列車上裝置零件，今日仍留存紀念。其後由師長推薦前往慶應大學支援的東京齒科大學附屬市川綜合醫院，擔任內科講師及主治醫師，持續臨床、研究與教學並進的日子，逐漸升等為副教授、教授，並傾全力整頓擴充內科部門，使得市川醫院內科頗具聲名。經濟情況也隨著升等而逐漸改善，從最初一家五口擠四疊半榻榻米大小的兩間臥室，到後來隨著升等而屢次換屋，雖然搬家十分繁雜辛苦，但我們覺得換屋真是件非常快樂的事。當時擔任教授不論是在醫院或在社會上已有一席之地，受人敬重且生活優渥。孩子們也順利成長，長女詩琳自慶應大學法律系畢業；長子建綱畢業於北里大學醫學系，任職於慶應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血液科，並修習醫學博士學位；次子建穎也是畢業於北里大學醫學系，任職於慶應大學整型外科，也正修習醫學博士學位。回憶這一段在異鄉奮鬥的日子，由衷感謝內人的全心全意照顧家庭培育子女，讓我無後顧之憂，而得以在醫療暨學術界有所發展。

自認為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是推動高醫旅日校友會的成立。赴日四、五年後，聯絡校友於農曆春節一起在東京飯店會餐圍爐，包括眷屬席開十幾桌，十分熱鬧溫馨。聯繫與推動工作大多由我與同為第二屆的簡德珍醫師負責，1973年終於完成了聯繫全日本校友的通訊名冊，分為醫、牙、藥、護四部分，因留學生在日本居所之變動性很大，名冊的完成實屬不易。完成聯繫工作後敦請第一屆校友陳世雄醫師為第一任會長；之後一年由東京地區、一年由其他地區校友，如此輪流主辦大會至今。當時台大醫學院尚無旅日校友會，而高醫校友會獲得校友熱烈參與、十分活躍。

旅日二十三年後，我於1988年毅然放棄在日本奮鬥的成果與職務，偕同內人回到台灣；因為，我摯愛的父親病了。雖然年年寒暑二期返台省親，終究無法承歡膝下而内心惶憂。家父身為大家族的家長，一肩挑起家族及事業發展的重責；乃至創辦高醫，關懷本土醫療和教育，以及為高雄市民之服務等等；在顯示他奉獻鄉梓的心力及多年劬勞。兄弟七人只我習醫，總覺得有特別的責任要照顧父母，同時有特別的責任要奉獻高醫。事實上家父嘗後悔讓我習醫，曾向親友表示寧可我留在公司幫忙，也許，這是那個時代唯一一位因兒子讀醫科而後悔的父親吧。終於在親情的召喚下返抵家門，然而遺憾的是回台一週後家父即住進了高醫附設醫院，自此住院五載直至辭世。家父住院期間，我每日清晨七時到達高醫研究室讀書，約於八時前去探視，之後再回科內工作；似是回到晨昏定省的日子，卻有著深重的精神負擔。家父辭世後年餘家母也因中風入院經二年辭世；為人子女者之哀慟莫此為甚。總計前後八年不敢須臾離開，最遠只到台北開會便匆匆而返。每念及家父家母住院期間獲得附院同事朋友們及後輩醫護人員之悉心照顧，心中的感謝與感動實難以筆墨形容，願藉此紙端敬申謝忱！

回到高雄，自然回到母校附院就職。第二年起擔任血液科主任，帶領骨髓移植之醫療團隊加速進展。隔年接任內科主任並兼感染科主任；由於當時高醫附院並無感染科之醫師，遂鼓勵進修且派三位醫師至國家衛生研究院受訓；以在日之經驗打造醫療與研究環境而充實感染科。在高醫的努力漸得到醫界的認同，尤其要感謝後輩醫師的支持，得以前後出任血液醫學會理事長、骨髓移植醫學會理監事、內科癌症醫學會理監事、內科醫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多年來並擔任衛生署之醫院評鑑委員，參與關懷台灣整體醫療體系發展與醫學教育之進步。



曾清楷教授擔任院長時，邀我出任副院長，其後擔任副院長達八年。最記得初回高醫時在環境清潔問題上著墨最多，甚至親自帶著相機一一拍下醫院中不合宜的環境情狀而要求改善；接著推行禮貌運動，開始選舉禮貌護士的活動；修改門診表之表列方式而沿用至今。點點滴滴、制度組織財務人事，莫不盡心盡力參與調整規劃。個人覺得較為重要的有下列數項：一、醫院試藥轉為統一議價。二、人事制度正常化；用人公開，革除紅包與親友遊說文化。三、法令制度化；在蔡瑞熊前校長之支援下建立法規會。四、屏東校區之籌備。五、參與工執會；關切學校建設發展。

提筆回顧來時路，不斷閃耀於心中的是師長親友及許多同事給我溫馨誠摯的幫助，平日言談間拙於表達由衷的謝忱，今日願恭謹於此鄭重言謝：

首先要感謝我所敬愛的師長與前輩，不論是在高醫或是在慶應大學，由於您們的指導與提攜使我得以在醫學領域成長發揮。

其次要感謝朝夕相處的同事們－後輩醫師、護理或技術人員、阿桑們…，有您們這群好同事讓我覺得很幸福，我們同心協力完成了許多事務，是我們共享的美好回憶。高醫是我們共同的家庭，我這些年來坦言直行、自我期許是為高醫而非為一己之私，我的坦率也許有許多得罪人的地方，在此要特別說一聲道歉，希望獲得諒解。

感謝親愛的兄弟們，在各自的職務上分工合作，為家族的成長盡心盡力；在我多年羈旅時，代為照顧父母長輩。也要謝謝內人與三位子女，你們無怨無悔的支持與關愛是我人生最大的動力。

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父親陳啓川先生。感謝他給我們的庭訓家教、讓我們終身受用無窮；感謝他在我留學日本期間想盡辦法支援我的生活；感謝他對我的深刻瞭解並賦予寬廣的自由選擇空間。

家父捐地興學創辦高醫，基本上因他心中有著如慶應大學般私立大學的理想藍圖，要獨立自尊、要有自己的理想與驕傲。在經營管理上，家父常認為可以交給合適的人來擔任而不一定要自己來做。這一點對我也有所影響，我的做人原則是先求諸己、先盡力而為努力不懈，不必去憂心職位患得患失；然而成果往往隨努力而來，就算不盡理想，努力耕耘的果實終究是甜美的。

高醫永遠在我心中，高醫永遠是我最深的掛慮、最高的期望！我期望高醫永續發展，是一個普及醫學倫理教育的醫學大學，是一個具有自己的理想與驕傲的學府，是一個在傳統的軌跡上求進步的大學。在此引用家父的話：「高醫是大家的」，高雄醫學大學是大家的，需要大家共同愛惜、團結合作、永續發展！

